

第一章

20 世纪的古汉语语法研究

第一节 古汉语语法研究的概况

一、50 年代以前的大略

马建忠的《文通》前六卷于 1898 年出版，后四卷于 1900 年出版。马建忠的这十卷本《文通》，后人通称《马氏文通》。《马氏文通》在 1900 年的 1 月份出版完成，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与传统小学的分水岭，标志着中国现代语言学在 20 世纪开始时正式诞生了。《马氏文通》以古汉语作为研究对象，收集大量的原始材料，进行系统的归纳分析，借鉴西方语法学理论，首创了汉语独立的语法学科。在《马氏文通》之前，中国古代学者关于语法的论述，主要散见于训诂学著作之中，偏重于虚词和句读，其目的是为解释古籍服务，是经学的附庸，没有形成系统的、独立的语法学科。正如孙中山

先生所说：“中国向无文法之学……自《马氏文通》出版后，中国学者，乃始知有是学。”（《孙中山选集》上卷，129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建国方略·以作文为证》）

在上半世纪紧接着《马氏文通》以后又出现了几本影响较大的古汉语语法著作，那就是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1907年商务印书馆）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1922年商务印书馆）杨树达的《高等国文法》（1930年商务印书馆）

在20世纪20年代初刘复的《中国文法论》（1920年，上海群益书社）和金兆梓的《国文法之研究》（1922年，中华书局）相继出版，这是文法革新派的两本代表作。刘复、金兆梓等看到中西语法的不同，反对削足适履地机械模仿西洋语法，主张推翻《马氏文通》的体系，另建汉语语法的新格局。

在上半世纪，还有几本语法著作把古今汉语放在同一个语法框架之中进行综合比较研究。最早出现的是刘复的《中国文法讲话》（上）（1932年，北新书局），刘复在该书《自序》中说：“文白兼讲 求其彼此合参而易于贯通也。”但《中国文法讲话》只出版了上册，而且只有薄薄的176页，第一部分为总说，第二部分为名词及代词。人们不能知其全貌，体系上也没有创新 他在《自序》中说：“讲法大半仍通行文法书之旧……不欲立异以鸣高也。”因此，此书影响不大。在汉语古今语法比较研究方面成绩突出的是黎锦熙的《比较文法》（1933年，北平著者书店）、杨伯峻的《中国文法语文通解》（1936年，商务印书馆）和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1942年-1944年，商务印书馆）。《比较文法》依据《新著国语文法》的体系，专讲词位与句式，拿白话的句子与文言的句子进行比较，书中还涉及英语和方方的例子，用来说明古今汉语语法的异

同。《中国文法语文通解》主要研究古今汉语词类变迁历史，其重点是虚词。《中国文法要略》从大量的语言材料出发来探讨汉语的规律，采用文言和白话对照的形式，通过古今语法比较来揭示汉语的特点。

在上半个世纪，还出版了几本有影响的文言虚字工具书。其中著名的有杨树达的《词诠》（1928年，商务印书馆），裴学海的《古书虚字集释》（1932年，商务印书馆），吕叔湘的《文言虚字》（1944年，开明书局）。

二、50年代以后的新发展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古汉语语法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下半个世纪的古汉语语法研究有以下的新发展。

（一）转向以汉语语法史为主

在上半世纪，古汉语语法研究的主流是泛时的“文言语法”，而下半世纪古汉语语法研究转向以汉语语法史为主，这个转变是古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重大飞跃。出现了王力的《汉语史稿》（中册——语法的发展）（1958年，科学出版社），后在此基础上修订成为《汉语语法史》（1989年，商务印书馆），潘允中的《汉语语法史概要》（1982年，中州书画社），史存直的《汉语语法史纲要》（1986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孙锡信的《汉语历史语法要略》（1992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向熹的《简明汉语史》（下编——汉语语法史）（199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等一批有影响的著作。

在一般语法方面，篇幅大、质量高的应首推周法高的《中国古代文法》（1959年—1962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杨伯峻、何乐士的《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1992年 语文出版社）这两本著作也贯穿了历史发展的观念。

（二）出现断代的和专书的语法研究

下半世纪还出现了一些断代的和专书的语法研究著作，其中有：管燮初的《殷虚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年，中国科学院）《西周金文语法研究》（1981年，商务印书馆）和《〈左传〉句法研究》（1994年，安徽教育出版社），陈梦家的《殷虚卜辞综述·文文章》（1956年，科学出版社），刘世儒的《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1956年，中华书局），许世瑛的《论语二十篇句法研究》（1973年，台北开明书店），詹秀惠的《世说新语语法探究》（1973年，台北学生书局）和《南北朝著译书四种语法研究》（1975年，台湾学生书局），倪志燧的《论孟虚字集释》（1981年，台湾“商务印书馆”），申小龙的《中国句型文化》（1988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此书是在其博士论文《〈左传〉句型研究》基础上修订而成）何乐士的《〈左传〉虚词研究》（1989年，商务印书馆），柳士镇的《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1992年，南京大学出版社），董志翘、蔡镜浩的《中古虚词语法例释》（1994年，吉林教育出版社），张玉金的《甲骨文虚词词典》（1994年，中华书局），崔永东的《两周金文虚词集释》（1994年，中华书局），廖序东的《楚辞语法研究》（1995年，语文出版社），吴福祥的《敦煌变文语法研究》（1996年，岳麓书社）。

（三）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热潮的兴起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吕叔湘最先对近代汉语进行拓荒，发表了一系列近代汉语语法方面的论文，其中有《释〈景德传灯录〉中“在”“著”二助词》（1940 年）、《论“底”“地”之辨兼及“底”字的由来》（1943 年）、《与动词后“得”与“不得”有关之词序问题》（1944 年）、《说们》（1949 年）、《说代词语尾“家”》（1949 年）等。这些论文，材料丰富，分析细致，论证严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文献、理论和方法等方面开辟了新领域。

五六十年代以后，近代汉语语法研究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1958 年出版的王力《汉语史稿》（中册）对近代汉语语法的一些重要语法现象作了描写和分析，如对“使成式”、“处置式”、“被动式”的产生和发展，对一些词类在近代的发展变化等，都有所涉及。1955 年，吕叔湘的《汉语语法论文集》出版，汇聚了他在 40 年代发表的近代汉语语法论文 12 篇。1985 年吕叔湘著、江蓝生补《近代汉语指代词》出版，该书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近代汉语指代词系统。1987 年，赵克诚的《近代汉语语法》由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论述近代汉语语法问题的专著。1991 年冯春田的《近代汉语语法问题研究》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结合相关句式探讨了一些新兴虚词的用法以及发展演变。1992 年，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合著的《近代汉语虚词研究》由语文出版社出版，1996 年，祝敏彻所著的《近代汉语句法史稿》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四）涌现出一批虚词研究著作

近年来，还出版了一批颇有质量的虚词著作，其中有杨伯峻的《古汉语虚词》（1981年，中华书局，此书是在其《文言虚词》的基础上扩大而成），何乐士、蔡镜浩、王克仲、麦梅翘、王海棻合著的《古代汉语虚词通释》（1985年，北京出版社）王政白的《古汉语虚词词典》（1986年，黄山书社），段德森的《实用古汉语虚词》（1990年，山西教育出版社），高树藩的《文言文虚词大词典》（1991年，湖北教育出版社），俞敏监修、谢纪锋编著的《虚词诂林》（1992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陈霞村的《古代汉语虚词类解》（1992年，山西教育出版社）何金松主编的《虚词历时词典》（1994年，湖北人民出版社），王海棻等编的《古汉语虚词词典》（199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等。

（五）开始汉语语法学史的研究

汉语语法学史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80年代以后，才相继出现几本研究汉语语法学史的著作，其中有孙玄常的《汉语语法学简史》（1983年，安徽教育出版社），林玉山的《汉语语法学史》（1983年，湖南教育出版社），马松亭的《汉语语法学史》（1986年，安徽教育出版社），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1987年，语文出版社），董杰锋的《汉语语法学史概要》（1988年，辽宁大学出版社），邵敬敏的《汉语语法学史稿》（1990年，上海教育出版社），朱林清的《汉语语法研究史》（1991年，江苏教育出版社）等。

三、外国汉学家的古汉语语法研究

在 20 世纪，国外汉学家也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古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著作。其中有苏联鲁达科夫的《汉语文言虚词实用辞典》（1927 年），日本新乐金桔的《先秦时代文法研究》（1932 年）日本太田辰夫的《中国语历史文法》（1958 年，日本江南书院。1987 年蒋绍愚、徐昌华的中译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和《汉语史通考》（1988 年，日本白帝社。1991 年江蓝生、白维国的中译本由重庆出版社出版），日本牛岛德次的《汉语语法论·古代篇》（1967 年），加拿大杜百胜的《晚周语法》（1959 年）《周初语法》（1962 年）《东汉语法》（1964 年）《诗经语法》（1964 年）《古汉语虚词词典》（1974 年，多伦多大学）日本志村良治的《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1984 年，日本三冬社。1995 年江蓝生、白维国的中译本由中华书局出版），美国屈承熹的《历史语法学理论与汉语历史语法》（1993 年朱文俊的中译本由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

第二节 古汉语语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一、后半世纪的研究成果和研究队伍大大超过前半世纪

回顾 20 世纪的古代汉语语法研究，可以发现，以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为时间界限，前半半个世纪与后半半个世纪相比，研究

成果与研究队伍有明显不同。

据唐钰明说：“自《马氏文通》问世以来，系统的古汉语语法研究已超过九十年。将‘后四十年’与‘前五十年’作比较，其相关数据可构成如下简表：

时 类 别	前五十年	后四十年	前后的数量比
研究者	59人	632人	1:10.7
著作	31部	221部	1:7.1
论文	113篇	1457篇	1:12.9

表列数据虽属不完全统计（因海外资料不足），但已足以表明‘后四十年’所发生的飞跃式的巨大变化了。（《四十年来古汉语语法研究》，《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270页，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唐钰明又云：“据不完全统计，60年来有关古文字资料语法的著作有7部（2部专门、5部半专门）论文63篇（含半专门），其中90%是50年代以后发表的。”（《古文字资料的语法研究述评》袁晓园主编《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

这两项统计大体上能说明20世纪前后两个阶段古汉语语法研究的数量对比的情况。如果再加上最后10年的论文、著作的数量，那么，后半世纪的学术成果的数量肯定会大大超过前半世纪。

二、研究内容方面的重大改变

上半世纪古汉语语法研究的主流是缺乏历史发展观念的古今杂糅的泛时文言语法，下半世纪转向以研究汉语语法史为

主，例如 20 世纪初《马氏文通》的用例，上自《尚书》、《诗经》，下至韩愈文；《高等国语法》的用例，上自群经诸子，下至唐人作品。有的文言语法著作，甚至把先秦作品与清末的文言作品都一律看待，统统拿来作为例证。又如《马氏文通》不分历史发展阶段，笼统地平列出七种被动句的形式，让人误认为这七种被动句式是在一个静止的平面上同时使用。实际上古汉语的被动句有一个变化历程，西周时产生了于字句、见字句，春秋时产生了为字句，战国末期产生了“为……所”式，汉代“为……所”式逐渐取代了其他几种被动句，东汉末被字才用于真正的被动句，直到唐代，被字句才逐渐取代“为……所”式，成为被动句最常用的形式。

50 年代以后，历时观念的确立和汉语语法史体系的构建，成为语法学者们关注的重点，1958 年王力出版了《汉语史稿》（中册——语法的发展），这是一个重要里程碑，该书首先以系统的动态研究代替了以往的静态研究，把上古、中古、近代、现代看成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而不是把数千年不断发展的汉语看作一个静止的平面。此后，专书语法研究、断代语法研究也加强了，历时性的专题研究蓬勃兴起。

三、研究方法上的明显进步

早期以《马氏文通》为代表的古代汉语语法研究受传统训诂方法的影响很深。语法分析以意义分析为主，忽视了语法形式、语法功能的分析。《马氏文通》根据“有解”、“无解”来区别实字和虚字，又云：“义不同而其类亦别焉，故字类者，亦类其义焉耳。（卷一）”字无定义，故无定类，而欲知其类，

当先知上下之文义何如耳。(卷一)而后期的研究受到西方的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如索绪尔的符号系统学说、叶斯柏森的三品说、布龙菲尔德的结构主义语法、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等,在语法研究中逐渐发挥作用,以意义为分析标准的研究方法基本上已被淘汰。

以前的语法学者常常采用主观随意的“举例式”的论说,而近年来逐渐加强了用数量统计方法来观察语言现象,并把数量变化的规律当做语言发展变化的标尺,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定性分析。例如周光午的《先秦否定句代词宾语位置问题》(1959年)统计了20部先秦典籍否定句代词宾语的用例,黄盛璋的《古汉语人称代词研究》(1963年)统计了14部典籍的用例,从定量分析中得出的结论当然要比举例论证客观全面,科学价值也较高。80年代、90年代采用这种穷尽式的定量统计分析方法的论著逐渐增多。

变换分析也是近来古汉语语法研究经常采用的方法,例如“夺之牛”之类的“动·之·名”结构,有人认为是单宾结构,有人认为是双宾结构。唐钰明用典籍中固有用例进行变换:“牵牛径人田,田主夺之牛”(《史记·陈杞世家》);“牵牛径人田,田主夺其牛”(《史记·楚世家》);〔汉王〕驰入张耳、韩信壁,而夺之军”;〔汉王〕驰入齐王壁,夺其军”(《史记·高祖本纪》)。同书或同篇中“之”可变换为“其”,说明“夺之牛”确为“动+宾”的单宾结构。

以前的语法学者常常满足于语言现象的描写,而忽视这些语言现象的背后的机制(如语义的关系、存在的条件、发展的源流等),近来有些语言学家强调应在描写的基础上对语言现象作出解释,例如梅祖麟在《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和词尾的来

源) (《语言研究》 1981年第1期)中就提出了“描写”和“解释”的问题,说“动+宾+了”变成“动+了+宾”是描写,说明“了”的位置为什么会从宾语后移到宾语前是“解释”。王克仲在《古汉语动宾关系的制约因素》(1986年)一文中对形成古汉语动宾结构的复杂语义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阐明了其内在与外在的各种制约因素,是描写与解释结合得较为成功的一篇文章。桥本万太郎、余志鸿等运用语言地理类型理论来解释古汉语语法中一些现象,也给人不少启发。

四、研究范围方面有所扩大

古汉语语法研究范围目前已经扩张到近代汉语、方言、汉藏语系和出土文献。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常常把汉语简单地分为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并认为其书面形式就是文言文和白话文。随着汉语史研究工作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在汉语的发展过程中,除了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这两个阶段外,还有一个近代汉语期间。近代汉语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吕叔湘是这一处女地的开垦者。吕叔湘以口语跟书面语的分化程度作为分期标准,他说:“尽管从汉魏到隋唐都有夹杂一些口语成分的文字,但是用当时口语做基础,而或多或少地掺杂些文言成分的作品是直到晚唐五代才开始的(如禅宗语录和敦煌文学作品)”(《近代汉语指代词序》学林出版社,1985)吕叔湘还认为:“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历史分成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是比较适合的。至于现代汉语,那只是近代汉语内部的一个分期,不能跟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鼎足三分。”

(同上)吕叔湘的意见受到大家的重视。近 20 多年来,近代汉语研究蓬勃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到目前为止,关于近代汉语的上限和下限的看法仍有分歧;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三者是鼎足三分还是一分为二,认识也不一致;如果一分为二,现代汉语是近代汉语内部的一个分期呢,还是近代汉语是古代汉语内部的一个分期呢?也还没有定论。

过去,在古汉语语法研究方面很少与现代方言结合起来研究,而近来出现一些结合起来研究的成功的论文。梅祖麟《汉语方言里虚词“著”字三种用法的来源》(《中国语言学报》1989年,第3期)一文从南北朝时期的“着”字出发,研究它在现代诸方言中如何变成了不同的语法成分。朱德熙《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中国语文》1985年第1期)《v-neg-vo 与 vo-neg-v 两种反复问句在汉语方言里的分布》(《中国语文》1991年第5期)从现代汉语方言中两种不同形式的反复问句出发,探寻它们在近代汉语中的表现形式。梅祖麟由源寻流,朱德熙由流溯源,都把死的文献资料和活的口头语言联系起来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邢公畹曾说过:“古汉语是流走了的水,但它作为一种自然语言的记录,下有由它演变而来的许许多多的自然语言(现代方言),上有与它有发生学关系的更大系统——汉藏语系,古汉语语法现象大部分保存在方言里,而有许多方言和古汉语文献证明不了的语法现象,又可以通过汉藏语系的比较研究来解决。”(1986年10月《在第一届全国青年古汉语语法研讨会上的报告》,转自袁晓园主编《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12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由此可见,古汉语语法研究和方言研究、汉藏语系研究互相结合,是一条充满学术生机的新路。

邢公畹在汉藏语系比较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在语法研究方面发表过《汉语“子”“儿”和台语助词 *luk* 试解》（1948年）、《汉台语构词法的一个比较研究——大名冠小名》（1949年）、《现代汉语和台语里的助词“了”和“着”》（1979年）、《论汉藏语系语言的比较语法学》（1979年）等。

俞敏在语法研究中也注意汉藏语言的比较研究。他的论文《汉语的“其”跟藏语的 *gji*》（1949年）通过汉藏语言的对比，发现汉语“其”字有许多前人未曾注意到的用法：“其”相当于“的（朕其弟——我的兄弟）”；“彼其”相当于“那边儿的（彼其之子）”；“何其”相当于“哪一个”或“什么”。《论古韵合帖没曷五部之通转》（1948年）一文，利用汉藏语音比较说明先秦合帖两部的动词、数词加一个舌尖收尾音就可以派生出屑、没、曷三部的名词来，以此说明语音上的“通转”，有些是一种派生新词的手段。俞敏《汉藏虚字研究》（1984年）一文，通过汉藏虚字比较，揭示了那些被方块汉字掩盖住的形态成分，认为古汉语有词头。比如藏语的动词可以带上前缀 *mg*，《诗经》中的“无竟维烈”“无念尔祖”的“无”也是与 *mg* 相似的词缀。《毛传》：“无念，念也。”

潘悟云的《上古汉语使动词的屈折形式》（1991年）结合藏缅语的研究，提出了上古汉语有自动词和使动词的对立，意义相关的自动词和使动词表现为语音的屈折形式，与清声母相对立的浊声母、去声破读和加前缀 *s*₁、加后缀 *s*₂ 都是表示使动意义的，联系汉藏语系来进行古代汉语语法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

以前的古代汉语语法研究，往往局限于传统的典籍，而后半世纪，语法学者们努力扩大研究范围，充分利用出土文献。

出土文献保存了历史原貌，比起辗转传抄、增删改易过的传世文献来，更为可信。不少论著成功地利用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互证，解决了不少语法上的疑难。在这方面，管燮初、陈梦家、裘锡圭、黄盛璋、黄景欣、陈初生、冯春田等人取得了不少成绩。例如裘锡圭的《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一文，引用马王堆三号墓帛书（星占书）“是是帚彗”、“是是个彗”等文句，证明先秦已有系词“是”，很有说服力。

五、虚词研究有了长足发展

下半世纪的虚词研究比上半世纪有了很大进展，改变了传统的训诂方式，加强了历时研究，重视了复合虚词研究。

在古代，古汉语虚词研究历来是为读经服务的，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属于训诂的辞训式，无法把握虚词准确的语法意义。元代卢以纬的《助语辞》清代刘淇的《助字辨略》王引之的《经传释词》都是用训诂的方法来研究虚词，是训诂学的一部分，而不是真正的语法学著作。自从西方语法理论传入中国后，我国语法学者开始用西方划分词类的方法来分析虚词，使虚词研究从训诂学中分离出来，归属到语法学中。这方面的代表作是《马氏文通》的虚字卷和杨树达的《词诠》，但它们仍有很深的训诂学烙印。试拿1992年出版的杨伯峻、何乐士合著的《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一书中的虚词部分与《马氏文通》虚字卷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20世纪后期的虚词研究已彻底摆脱了训诂学影响，有了显著进步。

近来的虚词研究加强了历时观念，重视探究各种虚词的历史发展。例如解惠全的《谈实词的虚化》（1987年）、刘坚的

《试论“和”字的发展，附论“共”字和“连”字》（1989年）张归璧的《“爰”焉”用法演变考略》（1990年）何金松的《虚词历时词典》（1994年）等。

从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到杨树达的《词诠》、裴学海的《古书虚字集释》全部不收复合虚词这是虚词研究的一个缺点。吕叔湘的《文言虚字》虽然只讲了24个虚字，却包含了许多复合虚词。例如“何”字条下包含了26个复音虚词或固定结构。此后，复合虚词引起了大家注意，近年来出版的虚词工具书，全都收有复合虚词。

六、对今后古汉语语法研究的几点建议

展望21世纪的古汉语语法研究，提出几点建议：

（一 改变轻视理论的倾向 引进新的理论和方法

20世纪以来，西方语言学理论日新月异，描写语法、结构主义语法、转换生成语法等，一个接着一个问世，其中许多理论和方法可以借鉴。这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多有回应，而古代汉语语法研究却对之反应冷漠。长期以来，古代汉语语法学界理论空气淡薄，许多语法学者习惯于解决具体问题，重视材料的描写和罗列，不善于运用现在通行而有效的语言理论来指导研究工作，不善于对表象进行抽象概括，上升为理论形态，曾经有人对最近30多年的古代汉语语法研究论文和著作进行统计，在871篇论著中，材料性文章有862篇，约占99% 理论性文章9篇，约占1%。（参见洪波、关键的《建国以来古汉语语法研究的反思和创新》，载于袁晓园主编的《中

国语言发展方向》，119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从这项统计，可以看出古代汉语语法研究轻视理论倾向的一斑。其结果，常使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因缺乏理论上的提炼升华而缩小了影响，降低了价值。今后应该在保持“实证”的优良学风的同时，加强理论意识，适当吸收变换分析法、语义特征分析法、形式和意义相结合分析法等等研究方法，并借鉴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些成功经验，把古代汉语语法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拓宽研究领域

应继续加强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古汉语语法与现代汉语方言语法的比较研究、古汉语语法与汉藏语系其他语言的比较研究，还要加强古代汉语语法与邻近学科的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如汉语史与汉民族变迁史的综合研究、汉语史与国内兄弟民族关系史的综合研究、13世纪至14世纪汉语和蒙古语的互相影响的研究等。

1991年中国语言学会第六届学术年会上，朱德熙曾提出要“把方言语法研究、历史语法研究和标准语法研究密切联系起来”。这个意见值得重视，是拓宽古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虚词研究史的研究有待开拓。历代学者对虚词曾有不少研究，但我们对历代学者的虚词研究的概况和成果、虚词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还缺少深入的探讨和总结，还要加强虚词发展演变的研究，亟需编纂一部高质量的虚词历时词典。

有些重要的句法问题（如受事主语句、主谓谓语句、兼语式、连谓式的历史变化）、词法问题（如助词系统、介词系统

副词系统的发展过程），还有待全面深入的研究。要加强专书和断代的研究，在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写断代语法研究，如先秦语法研究、西汉语法研究、东汉魏晋语法研究、隋唐语法研究、晚唐五代语法研究、宋元明语法研究等。在这些断代语法史的基础上，再编写出汉语语法发展通史。

加强专书语法分类索引的编纂 如《诗经》、《左传》、《论语》、《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世说新语》等名著 若能以语法现象为线索，把一本书中的所有有关的例句集中起来，对各书的各种词法和句法做穷尽性的收集归纳，编成索引，如果要查该书中的“是”字用法、“被”字用法或双宾语句式、兼语句式、前置式等，只须查考索引中的有关部分，就可一目了然，避免研究者逐页逐行查找之苦。专书索引工作现在落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当时有哈佛燕京学社编的《荀子引得》、《庄子引得》，叶绍钧编的《十三经索引》等。我们的索引工作也落后于邻国日本，日本学者从 50 年代以来编了《国语》、《楚辞》、《文选》以及唐人诗集和明清小说的索引多达数十种。而我们中国这些年仅见到《韩非子索引》、《李贺诗索引》寥若晨星 十分缺乏。我们要迅速改变这种落后状态，要充分利用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化手段，提高索引工作的质量，丰富索引分类的内容，同时要呼吁尊重编纂人员的辛勤劳动，出版部门也要支持这类书籍的出版。

（三）重视鉴定语言材料

过去，有些古代汉语语法论文对材料重视不够，根据少数例证就轻易下结论，甚至用了不可靠的例证。有人将几千年不